美日韩三方“同盟秀”为何演砸了？

复旦大学教授 沈丁立

沈丁立

近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美日韩副外长级磋商上演了尴尬一幕。韩国警察厅长登上韩日争议岛屿引发日方不满，原定的三方联合记者会临时取消，留下美国副国务卿舍曼独自一人会见记者。

这场美国精心策划的“同盟秀”为何演砸了？日韩关系僵局难解，对美国又构成什么挑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请专家为您详细解读。 ——编者

1 日韩翻脸 联合记者会泡汤

问：本次美日韩三边副外长级会谈因何不欢而散？

答：11月17日，美日韩三国在华盛顿举行了今年以来第二场三边副外长级别会谈。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竭力恢复美国的同盟战略，逆转特朗普任内由于标榜“美国第一”而狂奔的单边主义倾向。今年7月，美日韩在日本恢复中断达四年的三边副外长级会谈。然而，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二轮会谈结束后，日本和韩国代表均缺席预定的联合记者会。据媒体透露，在这场三个半小时的会谈中，由于日韩副外长之间爆发了激烈的话语冲突，两人决定都不参加会后的记者会。

这种情况，在美日韩各种规格的三边会谈中是非常罕见的，这对当前美国拜登政府试图组建多边联盟以对付东亚崛起大国而言，显然是个不利的局面。

美国主办的这场三方“同盟秀”之所以演砸，是由于美日韩三方之间各自利益犬牙交错，十分复杂。

虽然美国与日本、韩国之间分别建有双边同盟，但这三者之间并无军事同盟，尤其是在日本与韩国之间并不存在联合防御的彼此承诺，尽管两国过去一度决定分享情报。这不仅是由于日本曾经对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亚太地区实施侵略，更由于日本政府迄今仍对过去侵略战争的性质与日方责任采取了令包括韩国在内的诸多昔日受害方十分不满的立场，这导致了首尔与东京在深层次上彼此厌恶，不惜公开翻脸。

就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美日韩副外长级会谈的前一天，即11月16日，韩国警察厅长金昌龙乘坐直升飞机访问在韩军控制下并被韩国称为“独岛”的岛屿，而日本方面则称该岛屿为“竹岛”且为日本“固有国土”。日本在上世纪初曾经“国有化”该岛，并随之开启了日本全面侵略朝鲜半岛的历史。虽然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但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并未言及该岛屿战后的归属。韩国方面认为从历史、地理以及法律而言，“独岛”都属于韩方而且韩方已实施了有效控制，但日本方面长期不予承认，而美方对这一问题一直不持立场，听任这两个盟国去吵闹。

既然韩国认为“独岛”主权属于韩国，那么自然可以行使警察厅长造访该岛屿的治权，而且八年前当时的韩国警察厅长也曾访问该岛屿。11月18日，也就是美日韩副外长级联合记者会破局的第二天，韩国国防部长徐旭前往“独岛”附近的郁陵岛视察海空部队。但韩方否认此举与两天前韩国警察厅长访问“独岛”有关。

2 韩国借力设『话题』打压日本

问：韩国警察厅长为何选择在这一时机访问争议岛屿？

答：韩国警察厅长选择在11月16日访问“独岛”绝非偶然，很有可能是文在寅政府在明年任期结束之前的一场“公众秀”，旨在为文在寅在执政史上留下“抗日”清誉。如同所有前任，文在寅上台伊始雄心万丈，立志展开宏伟蓝图，然而其外交成绩依然乏善可陈：对华关系一度受美国“萨德”系统入韩的影响而空间有限；对朝关系高开低走，目前低迷；对日关系因为大打民族主义牌而陷入空前困境；对美关系受特朗普四年执政之牵制，很难有所作为。如果要为文在寅总统的外交地位寻找标签，似乎并不容易。

在对日关系已无重大改善契机，而且当前日本朝野也在等待明年韩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再谋求日韩关系开启新篇的时刻，韩国选在这场三国副外长级会谈的前一天，派警察厅长登临“独岛”，政治含义十分清楚：美国或许可以期待韩国与日本配合美国的地区发展与安全战略，但只要华盛顿真正希望建设以美国为中心的美日韩三边安全伙伴，它就不应对韩日之间根深蒂固的历史与主权争议听之任之。如果拜登政府不在乎朝鲜半岛以及文在寅总统的核心关切，那么拜登自己也将很难找到对自己有利的历史定位。

如果说韩国这一举动不是有意策划的话，那只能说明韩方决策缺乏外交敏感性，因为用韩日双边争议来“绑架”美日韩三边会谈，可能会令美方感到厌恶。

用美国副国务卿舍曼的“外交话术”而言，由于会谈中出现了与议题无关的争议，即韩日岛屿争议并非此次三边会谈议程，所以日韩两国副外长将不出席联合新闻发布会。美国事先必定是希望继续推动拜登设想的议程：团结一切盟国，稳定半岛与印太地区，牵制崛起大国，但结果却不如人意。美国再次显示了它或者没有能力，或者不愿尽力凝聚盟国，在全球新闻界面前表现了一场高等级外交会谈的挫折。

如果韩国政府此次确实精心设计了利用“独岛”主权议题，在美日韩三边会谈前上演“公众秀”以争取民心，认定即使对美日外交没有成果但仍能在国内政治上加分，这也反映出美国在韩国外交格局中地位的下降：韩国无意深度卷入印太大国博弈。

韩国在地区大国博弈中有着重大利益，除非美国在攸关韩国主权的核心问题上给予关照，否则无法指望韩国能放弃自身的重大利益而迎合美国。在当今世界，韩国的国家利益除了安全因素以外，还有广泛的经贸需求。即使是安全利益，为了说服朝鲜克制发展非常规武器的冲动，韩国除了美国以外，对地区其他大国也抱有希望。

3 三方恩怨 打断骨头连着筋

问：日韩矛盾会对美日韩三国同盟关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答：韩国与日本之间存在诸多关于历史与主权问题的矛盾，除了“独岛”与“竹岛”之争，还有关于日本上世纪对外侵略期间出现的“慰安妇”与强征劳工等问题。

尽管战争风云已过去七十多年，但这些对于朝鲜半岛与亚洲许多国家与民众挥之不去的问题依旧长期困扰着日本的对外关系，影响着日本的国际形象。然而，这不妨碍韩国与日本分别与美国建立军事同盟，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使美国在东亚部署了强大的军事存在。

在冷战时代，美国的这一前沿存在旨在对付苏联阵营成员。然而在后冷战时代，以全球化为标志的各国经济互联互通成为外延化之后的国家安全新内涵。在此意义上，冷战时代的军事同盟之功能与意义应该已经大大缩小。

虽然由于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的全球实力与影响力已有所下降，然而国际社会新旧矛盾依然层出不穷，一些国家对于美国的安全需求并未消失。

韩国当前面临的最大安全挑战，依然是半岛尚未统一但朝方已经获取核武器能力，因此它现阶段不可能结束对美国这个外来军事平衡者的需求。日本出于周边安全环境与自身利益，也仍然对美国的安全保障有着深度依赖。这种局面，非短期所能改变。因此在当下，以美国为轴心而对日本和韩国辐射的两组军事同盟不会由于日韩矛盾而有任何改变。

虽然，日本与韩国在历史与主权等问题上有许多不愉快，但东京和首尔就当前许多重大问题的意见，依然在诸多方面保持一致。这次在华盛顿举行的副外长级会谈上，三国高官就设定议题本身展开了认真讨论，这些议题包括应对气候变化、确保供应链弹性、共同努力结束新冠疫情、以及维持南海“航行和飞行自由”等，其中不乏与中国相关的议题。

当前日本、韩国和美国在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上有着较多共同点，他们虽然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持欢迎态度，并都希望从中获利，但也同时对中国的防务发展与整体崛起抱有警惕心理，不希望中国崛起形成对以美国为主导的现有地区与世界格局的再造，从而影响他们的安全与利益。

从这个角度而言，美日韩即使演砸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但美日、美韩两组平行的双边同盟尚不至于彻底演砸，美国也将继续带领日本和韩国整合三边政治与军事资源，力图形成一个三边防务伙伴关系。美国还有意把韩国引入所谓的“印太安全机制”，从而扩大牵制其他大国的“朋友圈”。

美日韩关系纵横交错，层次复杂。两组同盟，美国因议题而亲疏不同，盟友之间也在相互借力发力。这种兼容合作与矛盾的三方演义，在可预见的将来，可能还将延续。

深海评

澳大利亚对华释放善意，真是迷途知返？

范斯聪 新中心副研究员 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 武汉大学国家领土主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18日称，“澳方一直非常期待能够开启与中国的对话。只要中国政府愿意与澳大利亚展开高层会晤，澳方就欢迎。”鉴于澳中近来的紧张关系，莫里森的言论让外界直呼“惊讶”。

两年来，莫里森政府做了不少伤害澳中关系的事。就在15日，莫里森还在为自由党参议员帕特森打气，主张“与志同道合的政府合作，抵抗中国的干预”。此次莫里森话锋转向，真的是迷途知返吗？

数年来，澳大利亚忙着站队，试图得到美国的支持。自美国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将美中关系定性为竞争关系后，美国政府十分强调借助盟友的力量，维持有利于美国的权力平衡。

特朗普政府公布的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明确指出，盟友为帮助美国“威慑侵略”和维护全球有利的力量平衡提供了“不对称优势”。拜登政府延续了这一思路，并于今年9月与澳大利亚、英国确立了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澳大利亚也从美国那里得到了核潜艇技术的承诺。

澳大利亚如此热衷于在美英澳三边安全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是源于对国家安全的主观判断。2019年11月，时任澳国防部长琳达·雷诺兹在华盛顿的演讲中谈到，“威慑是为共同目的承担的共同责任，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实施，哪怕是美国。”显然，澳大利亚与美国有一个鲜明的共识，即“印太地区”现有的常规力量平衡不利于美国及其盟友。澳大利亚在2017年《外交政策白皮书》中表明了立场，试图建立一个“有利于我们利益的地区平衡”。但澳大利亚作为一个中等强国，与美国的联盟关系并不对等。

正是由于澳大利亚的“站队”行为，2020年5月以来，澳中高层对话大门一直处在关闭状态。虽然莫里森表示：“我们始终坚持自身利益，在这方面永远不会有任何妥协。”但是，国家利益是多方面的，当澳大利亚政府为了所谓的安全利益而伤及经济利益时，内心其实也难以接受。

澳大利亚不得不承认一个基本事实，即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很难撼动。于是，澳大利亚总理向外界呼吁澳中高层对话，再次释放对华合作信号，既是顺拜登之势而为，也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判断。

在澳中关系紧张的情况下，澳大利亚已充分认识到，本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性不容忽视。

2010年以来，中国不但是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国际游客来源国。根据澳大利亚旅游局的数据，2018年11月至2019年11月，共有144万中国游客前往澳大利亚。在此期间，中国游客为澳大利亚经济贡献了大约120亿澳元（约合87亿美元）。中国游客消费数额占所有在澳游客消费总额的27%，中国游客在澳人均消费为9235澳元（约合6673美元），远高于美国人、日本人和新西兰人。

对于地广人稀的澳大利亚而言，数十亿美元的损失足以让这个国家失去一个行业。在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仍在持续的背景下，维护澳大利亚与中国紧密的经济贸易关系，也是澳大利亚的重要国家利益。

过去的12年中，澳大利亚已经5次更换国家领导人。澳前总理基廷等政要纷纷指出，澳方制造了一个原本不存在的“敌人”，莫里森应当从前任那里汲取经验，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采取理性态度，推动澳中关系重回正常轨道。